

论“士”文化与中国的统一

张海滨

(大连水产学院 人文法律系,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都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但两个帝国在建立之初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士”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核心代表;而罗马帝国则建立在城邦政治文化传统之上,公民是其政治文化传统核心代表。秦汉王朝解体之后由于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保持了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形成了以封建骑士和基督教教士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并导致欧洲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分裂时期。

关键词:大一统;政治文化;士;公民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9)04-0012-04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是公元前后东西方两个最为强盛的大帝国,但二者在中西方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截然不同。秦汉王朝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历史的序幕,而罗马帝国所建立起来的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版图却成了西方统一历史的绝唱。为什么同样都建立起统一帝国,可接下来的历史走向却截然不同呢?本文认为,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大一统政治文化与城邦政治文化

在秦汉王朝统一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理念。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由原始部落进入到政治“国家”时期,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结构还十分松散。“此时的君王,最多也只像一个盟主,王朝强盛时,控制的邦国多一点,对各邦国的控制力强一些,邦国朝聘、纳贡频繁一些,恭顺一些;王朝衰弱时,各邦国往往自行其是,甚至另立山头,进而取而代之。《史记·夏本纪》称:‘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同书《周本纪》称,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结果是商代夏、周代商。”^[1]虽然此时的国家结构远不如

后世中央集权时期那般紧密,但在当时人们(主要是各个部落的统治者)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诗·小雅·北山》里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点实际上就已经明确了万国须一统于天子的政治理念。而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周时期中国就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了,只不过那时是“封建”制度下的统一,而非郡县制度下的统一罢了。《春秋》一书则首次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现实,人们探索实现天下太平的方法依然是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思路。因此,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才毫不犹豫的回答:“定于一。”可见,中国秦汉王朝的统一绝非偶然,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同时也符合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一贯强调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

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相比,罗马帝国建

收稿日期:2009-04-22

作者简介:张海滨(1981—),男,辽宁沈阳人,大连水产学院人文法律系讲师,主要从事东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立之前的西方则是典型的城邦政治文化传统。在罗马城诞生以前,在地中海及爱琴海岸附近,便产生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邦,这些城邦大都处于早期的原始部落阶段,每一个城邦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或者几个部落所组成。这些城邦之间经常为了粮食、土地、奴隶而发生争斗。这一点,非常类似于中国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状况。这些城邦的政治体制也千差万别,既有共和制也有君主制、僭主制等等。罗马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诞生于意大利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而像“罗马这个城邦既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2](P4)}如果说古希腊地区的城邦由于产生过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摇篮,那么在罗马城这里,人们能体会到的则只能是早期人类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姆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2](P1)}罗马城就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开始它数百年的对外征服,但这种征服本身没有类似于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理论指导,完全是服从于城邦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和少数贵族们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目的。这是罗马帝国的建立与中国秦汉王朝的统一的一大迥异之处。

二、“士人”文化与“公民”文化

秦汉王朝的统一主要得益于“士”人的崛起。“‘士’本是西周时期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之最低的一层(所谓下士)则与庶人向衔接,其职掌则为各部门的基层事务”。^{[3](P8)}及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很多上层贵族由于家道中落而沦为士(孔子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庶人即平民也可以通过军功等形式而晋升为士,于是“士”便成为了上层贵族与下层庶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管子》一书中便有“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士人大都没有独立的田产,但却饱读诗书、精通各种技艺。因此,当时的各国对于士人都尤为重视和尊重。而秦汉王朝统一天下背后的推动力量也正是来自于这一阶层。秦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边陲小国最终实现天下的一统,与商鞅、范雎、蔡泽、张仪、李斯等士人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而刘邦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民间小吏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得益于张良、萧何、陈

平、叔孙通、娄敬、陆贾、酈食其等为代表的大批士人的辅佐。故此,春秋战国时期及至秦汉王朝建立之初,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是典型的士人文化。“士”人最大的政治特点就是行道。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曰:“士尚志”,《孟子·尽心上》,即尚其所志之道。因此,士最关心的是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以及如何使天下由无道变有道及至实现天下太平,这才是士的真正使命,而不是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满足。虽然秦汉两朝统一天下所依赖的都不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所赋予“士”的政治特点在诸子百家中却是相通的,只不过各家各派所理解的“道”不尽相同罢了。

而罗马城在向四外征服的过程中却并没有类似于中国士人这样的一个阶层。因为让罗马城变得强大无比的并非是他们中掌握知识的某个特殊阶层,而是他们的共和体制所培育出的公民政治文化。罗马城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到成为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对外征服过程,而城邦内部的政治体制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公元前753年罗慕露斯建立罗马城到公元前510年最后一个国王“傲慢的塔克文”被驱逐属于王政时期;而从公元前509年第一次执政官的选举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则属于罗马帝国时期。而罗马帝国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主要是在共和国时期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正是在罗马处于共和制的几百年时间里,罗马在对周边民族的征服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此,罗马城的强大与共和体制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共和体制为罗马城的向外征服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共和体制下,执政官是很乐意发动战争的。“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而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2](P4)}另一方面,共和制培育了罗马人独特的公民精神。在共和体制下,元老院与平民大会分享城邦权力,每一个罗马公民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城邦的荣誉,共和制给予了每一个城邦公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赋予每一个公民与同样的个人尊严。

而且,由于罗马城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通过征服、掠夺来补充内部需求的传统,因此培养了罗马人喜欢冒险、勇于进取的精神。这种喜欢冒险、进取的精神品质与共和体制所给与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荣誉便构成了罗马公民精神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了罗马向外扩张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对于中国的“士”而言,天下的统一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说他是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天下统一可以实现统治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满足统治者个人的政治野心和物质欲望;说他是手段,因为对于每一个士而言,天下有道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天下统一只能是实现天下有道的第一步,如何实现真正的天下太平、文化大同才是他们真正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罗马的公民而言,征服本身就是最终目的,罗马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在文化上特别是哲学上是鲜有建树的。因此,他们缺少对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最终命运的思考,这也就使得他们的征服仅仅是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而非文化上的胜利。罗马人很善于学习,“他们只要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习惯,他们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习惯”。也正是由于这个传统,使得各个被征服的地区依然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而整个罗马帝国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与价值观的。

三、“士大夫”文化与骑士、教士文化

秦汉王朝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之后,便开始着手构建思想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不仅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更是希望通过焚书坑儒这样的极端措施来统一帝国的文化,可惜适得其反,一系列暴政最终导致秦仅统一了15年就被汉所取代。汉朝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奉为官方正统思想。从此,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天下士人皆为儒士,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被尊为圣人,成为天下士人所学习的楷模。孔子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成为天下读书人所共奉的信条。而自汉以来及至隋唐元明清各朝,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天下读书人总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渠道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而纵观自汉以来的历朝历代,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士始终是统治阶级中的核心力量。因此,士大夫便成为了这些通过读孔孟之书而入朝做官的读书人的代名词,士大夫便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阶层。这些人“进于上则干济政治,平治天下;退于

下则主持教育、传播文化”。^{[4](P45)}因此,中国的士大夫集政治管理与传播文化双重任务于一身。一方面,历朝历代的官员,上至中央,下至郡县,大部分都由士人担任,他们起到的是政治管理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维护者,他们在为官的同时也同样是文化的传播者。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统治长达2000年之久,士大夫们的弘扬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秦汉之后,中国经受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与宋、辽、金、夏对峙等长期的分裂时期,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完成统一的历史局面,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士大夫的文化和精神传统从来没有丢弃过。也正是这些既有政治管理经验、又富有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士大夫们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可以薪火相传、延续至今,也保证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可以在中国长期维系。

而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共和体制下罗马公民们冒险与进取精神所孕育的结果。但罗马人对于各个地区的征服并不带有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并且在维系一个庞大的帝国统治时,罗马人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们严密与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不是统一的文化。因此,虽然罗马采取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行省制度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统治,但派到各个地方去的行省长官却不像中国的士大夫那样兼具政治管理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保证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并且保证按时纳税而已。对此,罗马史专家也毫不迟疑的指出:“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实,即罗马人从未意识到他们是较高文化的传教人,因而觉得有神圣的义务将自己的文化加诸属民。他们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语言、宗教、以至政治组织方面的事。他们在这些事上是不肯加以干涉的。这种宽容当然也有一个限度,即以和平得以维持,属民照常纳税并满足政府对于服兵役的合理要求。”^{[5](P121)}虽然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后期,基督教被奉为国教企图挽救罗马在这方面的缺陷,但此时的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基督教依然不能改变罗马帝国东西分治的局面,更挽救不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刚刚走出原始部落文明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占据了大部分昔日罗马帝国的领土并建立起数量众多的小王朝,但政治管理经验的匮乏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贫瘠与空虚使得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基督教的帮助以维持他们各自的统治。因此,封建制度与基督教便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的两大核心要素。而代表封建制度的骑士与

代表基督教精神的教士则将中世纪打造成了一个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在世俗世界里,骑士们继承了罗马人进取与冒险的精神,他们承担着政治管理的责任,但却不具有传播文化,弘扬社会基本道德与价值规范的使命。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奋勇厮杀着,但结局却是每一次统一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里,教士是带领人们通往基督世界的向导,也是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与基本道德规范的弘扬者与守护者,同时还凭借着基督的感召力以及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教阶制度建立起一个人口众多的教皇国家,即使是国王也要聆听他们的训示。而对于中世纪欧洲的人民来说,他们既属于国王统治下的世俗世界,又属于教皇统治下的基督世界。这样的一个二元社会所同时并存的两股力量都在拼命的撕扯着每一个人的躯体,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欧洲在政治上彻底被解体了。因为世俗的国王与掌管精神世界的教皇都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权力与责任,都想将两种权力与两种使命集于一身,但双方又都缺乏将这两种权力与使命集于一体的能力与传统,所以中世纪

的欧洲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长期陷入分裂局面。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而这也必将对当今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民族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都可以从他本民族的历史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只有认清自己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才能够找到最适合本民族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J].民族研究,2005,(1)
- [2]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5] G.H.Steveu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ill the Age of the Antonine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

责任编辑:郭洋溪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and China's Reunification

ZHANG Hai-bin

(Dept of Humanities and Law, Dalian Fisher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China's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Roman Empire were unified empires of great popularity, but they were totally different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beginning. China was a country of great unity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scholars-officials"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ts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man Empire was built on the basis of city-stat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citizens being the core representatives of its political culture. China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this big unity as a result of the long-term duration of the scholar culture. But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urope saw the rise of a dual soci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feudal knights and Christian priests, and hereafter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 division.

Key words: big unity; political culture; scholar-official; citizen